

香港反送中運動：劃界、翻譯與轉型*

The Hong Kong anti-ELAB Protest Movement: Bordering, Translation, and Transitions

蘇哲安**

Jon SOLOMON

一、一道前線

2019年發生在香港並延續迄今的抗議運動——即「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anti-ELAB movement）（下文簡稱「反修例運動」或「反送中運動」）在國際上的相關激辯中，因其國際地緣政治與左翼反帝國主義立場的意義而成爲焦點。雖然衆說紛紛，可是評論者幾乎清一色都預設了同樣明確的地理單位作爲依據。換言之，就政治構成（political composition）的面向而言，這場辯論無論是以中文、英文或法文呈現，基本上都以既有的國際邊界爲框架。根據此框架，對香港的描述一直延續著一個半世紀以上的慣例：將香港定義爲一個前哨、一個文明間的互動區、一個夾縫生存、中西合璧的地方。正因如此，這場運動的關鍵——劃界的行爲，要麼被完全忽視，要麼被納入其他諸如身分認同、主權、自由等議題而被分散和遮蓋。相對於一些評論者將香港看成是個對抗諸如集權主義、監控式資本主義或數位獨裁等強權形式的全球性鬥爭的前線，這篇短論要闡明的目標在於：香港確乎是一道「前線」，但在完全不同的意義上——其成爲「前線」的原因，正是因爲劃界實踐（bordering practices）早已構成了當下全球政治局勢的核心。根據香

投稿日期：2020年3月3日。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9月21日。

* 本文摘錄自即將由唐山出版社推出的同名單行本。

** 蘇哲安，里昂大學教授兼巴黎十大跨科多語研究中心研究員。

聯絡方式：jon.solomon@univ-lyon3.fr。

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葉蔭聰：「香港新一波的本土社運主義，就是一種打造族群統治之治理主體（ethnocratic governing subject）的計畫，承載著管控這個都市與中國之間各種想像與物理邊界的令式（imperative）。該令式的核心就是一種管理人口流動的生命政治意志。」（Ip 2020: 54）本文主張這種牽涉邊界的生命政治，並非只有香港，而同時也是當前全球規模最大且最為普遍的挑戰。在經濟國族主義逐漸成為世界各地政治主流的當下，一種回歸邊界的意志，對於本來深受邊界烙印的人文學知識的影響其實更為難測。面對這些生命政治意志的種種動盪與主張，什麼樣的知識實踐才足以抗拒邊界的回歸，進而協助眾人脫離生命政治及其權力擴張下所帶來的困境？我認為一個重要的線索可從旅居紐約研讀碩士，身兼記者與青年學者的陳偉福（Wilfred Chan 2019/08/08）在美國《異議》（*Dissent*）雜誌發出的呼籲進一步追蹤：「國際左翼的當務之急，是跟香港人合力研究一種新的分析，不是拿著未消化、反芻過的西方框架套用在香港的境遇上，而應是從這麼一個『之間』的地方（this in-between place）的角度出發，勇於重新想像反資本主義、反獨裁的生存政治。」¹為了對此新的分析框架做出貢獻，我打算將陳偉福稱之為「之間」的狀態當做問題意識兼方法論。以資本對勞動發起持久戰當中的劃界實踐為背景，開闢批判性的新視野，縱使最後可能與陳先生預期的結果漸行漸遠。套用尼爾森（Brett Neilson）和梅紮德拉（Sandro Mezzadra）劃時代著作的標題「邊界為方法」（Neilson and Mezzadra 2013），投身於學術界而掀起「劃界轉向」（bordering turn, Sakai 2010）一事，能讓我們重新思考「前線」的當代意義。不只是香港，其實世界上每個地方都是一種「之間的地方」，一種對抗生命權力的「前線」。

二、所謂「外國的角度」

雖然本文的重點放在香港反送中運動前後「回歸邊界」這個趨勢的

1 譯文題為〈抗爭是香港重生之門〉，2019年10月29日見於香港《夜貓媒體》網站，譯文略微修改。

問題，可是爲了凸顯該問題的跨國性質，我認爲一開始不妨從國際論述說起。就香港抗議運動的情形來看，國際評論基本上集中在地緣政治的國際意義。以法國的脈絡爲例，無政府主義兼左翼網路期刊《週一上午》（*Lundimatin*）相關的辯論頗有代表性。旅居臺灣的法國哲學家布洛薩（Alain Brossat）發表了三篇系列文章，詳盡的分析下將香港的運動認定爲一場聯合西方對抗中國的政治倒退（Brossat 2019/11/01, 2019/11/25, 2019/12/09）；而在同一法語政治刊物上，另一篇匿名發表、題爲〈水來了〉（“Water is coming”，法文原文以英文篇名刊登）的分析中，香港的運動反而被視爲一種雙重對抗，同時針對中國和西方這兩個被斥爲同屬資本主義全球集團的共謀大國（*Lundimatin* 2020/01/10）。

國際評論者分析反修例運動，包括如同〈水來了〉一文的作者那樣用心，專程赴港去現場觀摩與學習的人，總是不免透過一些語句間接或直接地透露，他們自認站在「外國的角度」展開分析，並在此基礎下以道德律令的口吻，一致呼籲國際的支持（或反對）。「外國的角度」雖然聽起來合情合理，可是其中隱藏著許多潛在預設頗值得分析。以下兩個明顯帶有預設立場的段落引自〈水來了〉一文，恰好可以說明外界觀察者普遍對邊界的設想：

反對逃犯條例的運動提供了一個鬥爭的基礎，可以拿來對抗當下和普遍形式的權力（基礎設施，網路，員警）。

[…]

我們更願意揭露那邊〔按：指香港〕吸引我們的東西以及應該穿越邊界被分享的東西。（*ibid.*；粗體另加）

隔著「那邊」與「這邊」的「邊界」，以及這個「邊界」與「普遍性」之間所建構出的格局倘若令人感覺非常熟悉的話，那一定是因爲這是一種頗具代表性的現代性典型結構。²就像現代性必須視爲「殖民」與「帝國」兩種對立面的結合體一般，〈水來了〉一文所依賴的世界版圖，歸根究底還是由普遍主義vs特殊主義這組二元對立概念組成。而這些不同區塊之

2 有關這種源自殖民—帝國現代性跨國團結政治的批判，請參見敘利亞異議分子薩勒（Yassin-Haj Saleh 2018/07/16）的短論。

間的關係，則被想像成一種可以訴諸空間式的邊界去理解的東西。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水來了〉一文還是布洛薩的系列文章，即使最後對運動的政治性質下了南轅北轍的結論，可是終究都還是以邊界分隔開來的政體—香港，中國和西方，作為分析架構的依據。總之，這些刊登在法國《週一上午》、有關香港反送中的文章中，作者們都把某些知識型—地理學（epistemo-geographical）實體當作出發點，卻並未思考持續生產出又反覆複製這些實體的劃界實踐，也沒有去思考這些實踐不斷被遮蓋、擦寫，賦予不同意義的過程。對這些劃界過程缺乏關注，正是布洛薩的系列文章和批評布洛薩的文章——〈水來了〉一文共同的特徵。最具代表性就是〈水來了〉一文將中國和美國聯合起來，指出「中國和美國是兩個國家，但卻被統合在同一個體系內：資本主義，其當下最新版本為新自由威權主義」（ibid.）。這種觀點假設放在一個著眼於邊界的脈絡來看待的話，就好比意味著邊界其實是一種假象，一種虛假的意識形態而已。看穿了邊界，全球資本主義的共謀才會真相大白。然而，如果眾多邊界都像一種「虛假意識」，可以輕易看穿的話，它們一定不可能持續存在這麼久。

將邊界視為意識形態假象一事在方法論上其實意味著國族形式的問題與資本主義轉型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必然關連。根據這種方法論的觀點，國族形式相對於資本主義而言，要麼是一種人類社會的基本組織單位，要麼是一種假象。這種方法論上的預設就注定連帶導致這樣的後果：「邊界」不但會被想像成一種純粹的空間裝置，而且更會讓我們將這種空間式的想像塞進另一種兩者擇一的二元格局，就好像邊界要麼是一種必須接受的既定事實，要麼是一種需要取消的障礙。

或許正是因為忽視了邊界作為社會實踐的特殊性質，所以這些外國觀察家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願意承認：近年香港向認同政治全面傾斜一事，意味著左翼的某種歷史敗北多多少少是反送中運動的重要歷史背景。但是他們並沒有去探究香港的左翼乃至全球左翼，對於過去數十年對各種回歸邊界、重建邊界的呼聲與行動，甚至是帶頭湧起一股回歸邊界的大浪潮。

三、運動的翻譯：回歸邊界

與大多缺乏歷史視野的新聞報導與國際政評相比，有必要記起的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本身即鐫刻在一個十五年前就開始的政治動態發展次第中。始於保衛天星碼頭（2006）、反對跨境高鐵（2009）到占中（2011）和學民思潮（2012），再到雨傘運動（2014）及其餘波的這一政治次第過程中，香港左翼內部經過一番重大的辯論，讓進步陣營對於諸如身分、自決、移民、自由和歷史記憶等問題意識的框架漸漸全盤接受。這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發酵劑便是一場令左翼在香港社會整體上喪失信譽的輿論運動。其標誌包括在2010年代開始廣泛流通「左膠」³與「大愛左膠」等說法，導致「左翼」的定義徹底脫離了社會關係與生產之間的關連，並完全受限於一種道德關懷的框框。在蘇聯崩解的後冷戰時期，「左膠」一詞應該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嚴重扭曲的結晶。在共產主義這個時代地平線（Nancy 2003: 3）被徹底否定，甚至被絕對罪惡化的歷史條件下，「左翼」的可能意義基本上被化約為一種人道關懷、代言發聲的立場而已。更甚者，「左膠」一詞其實還添加了一層生命政治轉向的內涵。例如，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鄭松泰（2014/01/14）在議論「左膠」政治意義的短論中，將馬克思主義分為兩種以文化或文明為特徵的流派。其一為「強調人文價值和社會批判」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其二則是「強調集體意志和社會革命」的「東方馬克思主義」。如此籠統而虛構的文化主義區隔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東方專制主義論」，頗能反映出香港文化、知識界後冷戰時期所形成的歷史成見。那是一種富有生命政治預設的情感—知識結構。⁴追根究柢，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被認為與後

3 關於「左膠」一詞的歷史及其意義的轉變，請參見Ip（2020: 93起）與鄭松泰（2014/01/14）。

4 工黨創始人之一兼中文大學教授梁啟智2017年發表的著作《獨立路上：從前蘇聯省思香港未來》可以視為這種歷史成見孕育出主觀意識的代表。作者親自赴前蘇聯各國現場見證，並以國族主義發話形式建構出該書的目標讀者（分為「相信香港獨立」、「相信民主自決」與「一國兩制的忠實支持者」三種類別）。然而，作者見證諸如斯達林主義的殘暴、人道主義與布爾喬亞消費社會價值觀的關連、「國際標準」與西方的潛在等同、「西方」不言自明的統一性，以及超越歷史與政治滄桑的民族主體性等等一系列主題，其實都不是什麼

殖、後帝在世界地圖上的政治分界完全無關，乃是左翼吸收右翼對共同體的基本預設的標誌。那些歷史成見最直接的後果就是讓資本主義積累體制與後殖民主義主權之間的關連，這個至關緊要的命題，完全被遮掩。於是乎，邊界不再是一種可能與勞動商品化有關的社會實踐，而是一種面對權力關係時檢驗道德高尚度的指標而已。就香港的脈絡來說，最能代表這一取自右翼深層轉向的表現，莫過於人們逐漸接受將政治構成的可能性與保衛香港和中國內地之間的衆多邊界一事連接起來。⁵香港的知識與文化界從2006年天星碼頭事件起，幾乎整個精力與創意全部都灌注在歷史記憶的保全以及再現／代表權的爭取這兩項大任務上，導致回歸邊界的轉向不知不覺成爲一種政治霸權。總之，香港左翼面對回歸邊界呼之欲出的浪潮之際，不是將邊界視爲道德問題，就是放棄了試圖從邊界的角度去分析社會關係中的剝削與支配並運用此一觀點去發明截然不同的政治願景。⁶

香港社會普遍以雨傘運動爲分水嶺事件，認爲該運動最大的教訓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路線的徹底失敗，「任何體制改革可能」都被徹底「壓制」（葉蔭聰2020）。相對於那樣歷史敗北的敘事大綱，我反而認爲雨傘運動的挫敗底下還有另一更深層、更久遠的歷史敗北需要注意。如此重大的挫敗，恰恰可以從國際左翼那樣抵賴自身曾大規模參與這些歷史和劃界實踐來解釋。要想否認包括香港在內的國際左派在這類劃界實踐中負有某種政治責任，就等於是判它無期徒刑。即使這種挫敗在一種虛假勝利的假象之下暫獲粉飾（如同歐巴馬〔Barack Obama〕獲選美國總統）。我的意圖並不是想把左派描述成一種注定要失敗並因此才有道德意義的事情（套用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說法，那是

現場見證的產物，而是出發前早已在他方被定格的後設敘事。有關後蘇聯東歐挫敗的轉型與世界版圖尚未完成的解殖改變，請參見Buden（2009, 2020）；有關俄羅斯的部分，請參見Wood（2018）跟Wedel（1998/05/14）。

- 5 想要瞭解香港反中共左翼在雨傘運動前後重獲社會信任的射程，不妨參考由歐龍宇（Au Loong Yu）等人2010年籌組的《左翼21》團體吸收諸如主權式的自治、新移民與身分認同等回歸邊界主題的經驗便可掌握。請參見《獨立媒體》上〈左翼21網誌〉<https://www.inmediahk.net/user/502775/post>。
- 6 香港左翼一個顯著的例外就是《自治八樓Autonomous 8a》那樣堅持從遷徙人口議題切入其他問題的路數，與道德關懷代言發聲截然不同。請參見：<https://smrc8a.org/>。對於《自治八樓》的歷史總結，請參考懷火（2019/07/24）。

一種lost cause），更不是想釘下幾個棺材釘讓它盡快消失。儘管我強調左派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之前已經陷入了挫敗一事，看起來像是在重複柯西彥（Razmig Keucheyan）最近透過《左半球：圖繪今日批判理論》（*Left Hemisphere: Mapping Contemporary Theory*, 2014）一書所發布的左翼驗屍報告一般，但其中卻有著關鍵性的不同。柯西彥從未如其承諾的那樣描繪出新的全球製圖學。相反，他的分析卻依賴於一種繼承自殖民—帝國現代性製圖學的區域邊界，只是同時又添加了一種對於非西方更加「代表性」的視野而已。

相反的，我採取的繪圖方式一開始就對創造出諸如文明和民族國家等種種區域的劃界行為提出嚴重質疑。之所以要提出質疑的理由並不是因為一種教條式的解構慾望，而是因為這些區域邊界的複製偏偏給資本主義積累機制提供了關鍵的支援，為它賴以生存的抽象勞動再生產一事鋪路（Walker 2019）。這裡或許仍需重提那句老生常談：資本無法直接生產出作為商品的勞動力——這一操作需要一系列間接機制的仲介方能完成。在這些機制當中，劃界實踐及其自然化扮演著關鍵角色。

觀察劃界實踐運作的最佳領域莫過翻譯。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一些常見口號的翻譯問題恰好可以引為例證，用來探討劃界與翻譯如何並肩齊進。或許有必要說明一下為什麼選用口號當做研究對象。畢竟，趙蒙暘在一篇批判反送中「右翼轉向」並引起廣泛討論的文章裡，認為：

香港街頭的右翼轉向，並不是抽象的香港光復和獨立口號，不是具體的臨時政府宣言，也不是暴力手段的迅速日常化和激進化。口號、宣言、勇武和暴力行為都只是運動中的劇碼。（趙蒙暘 2019/10/10）

源自堤利（Charles Tilly，亦作蒂利）社會學的劇碼（*repertoire*）概念，在社運研究裡早已成為了一種顯學，與本文強調的「展演性」表面上有些許關連。

堤利的方法論正好可以順便拿來當做一個參照，襯托出本文截然不同的理論旨趣。根據堤利2006年發表的《體制與劇碼》（*Regimes and Repertoires*）一書的構想，劇碼的定義是個相對於固定「體制」（*regime*）

的概念。如果想要從根本上瞭解「體制」的意義的話，必須去參考堤利在2005年發表的另一著作《身分、邊界與社會聯繫》（*Identities, Boundaries, and Social Ties*）。在該書序言裡，堤利清楚指出：

嚴謹來說，我們要觀察互動（transaction）而不是關係。不同的社會位置彼此間相互轉移能量，即使是顯微鏡下的事。從一系列的互動中我們就可以推論出一份位置之間的關係：一份友誼、一份競爭、一份聯盟抑或其他。（Tilly 2005: 7）

本文採取的方法論對關係的理解完全相反。堤利將關係視為各種位置之間互動的產物。因為關係相對於位置原則是派生的，所以堤利將觀察的對象鎖定在位置，這個負有原生意義的東西之間的互動上，以及互動關係對位置帶來的變動。而本文採取的方法論出發點可以說是180度相反，視關係先於位置。方法論上的分歧最顯著的反映便在於對邊界的理解。由堤利指出「身分〔…〕取決於我們跟他們的邊界」（Tilly 2005:7），本文旨在追蹤邊界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軌跡，從中抓出「我們」和「他們」成立前的契機。翻譯正好就是劃界實踐最佳的案例。從劃界實踐的角度著手，我們就不必如同堤利那樣將「人民共同體」視為一種給出的對象⁷。假設硬要沿用堤利的概念架構的話，我們或許可以說，作為劇碼的口號翻譯所相對應的「體制」就是一個超出一國範圍的跨國翻譯體制。然而，即使如此，堤利強調凡是運動的主張均由「認同」（identity）、「位置」（standing）與「大綱」（program）三種元素構成這個理論架構，還是無法應用於口號翻譯這個「劇碼」身上。畢竟，以上三種元素都屬於再現—代表（representation）的範圍，而翻譯實踐的理論恰好立基於再現—代表架構無法說明的現象——非連續性（下文詳述）。然而，堤利的社運研究架構，在方法論上防堵了從實踐的角度去批評邊界再現的可能。因此，我堅持認為將翻譯口號視為劇碼一事有所不妥或尚待補充之處。

7 根據羅傑斯·布魯貝克（Rogers Brubaker），堤利並未去探討國族劃界的問題：“He did not ask about what made the language of nationhood plausible, resonant, meaningful, or inspiring to ordinary people—or indeed if and when it was plausible, resonant, meaningful, or inspiring to them. He did not ask how people who belonged to particular states came to understand themselves as belonging also, or indeed primarily, to particular nations. He did not ask how ordinary people came to identify with and commit themselves to elite-led national movements.”（Brubaker 2010: 379）

首先，我們來針對由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籌辦2019年8月16日集會的預備工作中出現「英美港盟，主權在民」的口號展開分析。該口號當初出現時就已經搭配現成的英文翻譯：“Stand with Hong Kong and Fight for Freedom!（與香港站在一起，為自由而戰！）”抑或“Stand with Hong Kong, Power to the People!（與香港站在一起，權力屬於人民）”。前者正好也是協辦單位「我要攞炒」團隊的英文譯名。「攞炒」一詞原本是撲克牌的俚語，有類似「同歸於盡」之意。⁸「我要攞炒」乃是香港論壇LIHKG（中文俗稱「連登」）上的會員暱稱，從2019年6月起開始號召鄉民成立「我要攞炒」團隊，旨在動員國際勢力，特別是考慮到英國認定中方違反1984年簽署並翌年在聯合國登記為國際條約的《中英聯合聲明》。「我要攞炒」早在2019年6月11日在連登上呼籲：「最後，在此溫馨提示香港政府——假如中英聯合聲明被判失效，根據1841年穿鼻草約、1842年南京條約及1860年北京條約，英國有權強行回收香港島及九龍半島。」（我要攞炒2019/06/11）顯然，中文與英文口號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種簡單的直譯概念，而是採取一種當下盛行的「文化翻譯」的結果。有趣的是，這種文化翻譯的格式透過全球英語媒體就獲得了規模可觀的全球散布。假設將如此病毒式的文化翻譯中的英文與中文作為一個整體看待，那麼非對稱性的中、英兩句口號及其相關的脈絡共建了一種奇妙的等同鏈，將主權與自由等同起來。通過翻譯的媒介，該非對稱性的等同關係背後的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意識形態與人種差異預設，在下文中會專門討論。

與之類似，採自香港分離主義者梁天琦（Edward Leung）的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⁹，同樣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翻譯體制預設差異的包裝手法去加強其功效。該口號通常（誤）譯為英語作“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解放香港，我們時代的革命）”，但中文口號的「解放」概念全由「光復」一詞擔當。「光復」一詞是個歷史悠久

8 有關攞炒一詞的翻譯問題，可以參見趙平復（2019/08/10）。有關攞炒的學術討論可以參考陳清橋（Stephen Chan 2020）與葉蔭聰（2020）。作為政治概念，攞炒的前身在於2014年雨傘運動後所謂「焦土派」的崛起，請參見周顯（2018/04/11）。

9 關於該口號政治含意的各種不同詮釋，請參見李宇森（2019/08/13）。

airiti

的詞彙。比如「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晉書·桓溫傳》）；到近代中國，章炳麟在〈革命軍·序〉中寫道：「今中國既滅亡于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章太炎2017）可見，與其說是收復失去的「主權」這樣的現代國家概念，「光復」一詞在中國歷史上的含義更直接意指「收復失地」之意。到了民國時期，國民黨在1945年從戰敗國日本手中收復臺灣，翌年制訂「臺灣光復節」紀念之，確實具有收復失地之意。然而，該黨於1949年失勢遷臺後，「光復節」隨即成爲一種意識形態工具，意圖給大陸遷臺的主權者合法化，並讓原本的日本國民——臺灣本省人產生皈依中華民國的情感。這個「光復」所對應的現實（例如228事件與白色恐怖）恰恰是殘酷的，爲了臺灣的民主轉型投下了極大的陰影。香港本土派在2010年代起開始將「光復」一詞引進他們的抗爭詞彙，實爲一種矛盾的表現，對於該詞錯綜複雜而多元的歷史含意似乎包含一種一邊喚起記憶、一邊壓制記憶的功能。

「光復」一詞最早進入回歸之後香港政治行動的詞彙裡，可以追溯到梁天琦在2012年在上水舉行的一次示威活動中的使用。上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毗鄰中國大陸的一個小鎮。爲反對跨境走私平行交易的水貨客，示威採用了「光復上水！」的口號。雖然水貨客是中、港兩邊的商人，並不只是大陸人而已，可是現場拍攝的照片中，示威者們所舉的標牌上寫著「中國人滾回中國！」（Cheung 2015/07/15）一事，足以顯示該口號回歸邊界的意味非常濃厚。繼而到2019年7月「光復屯門公園」事件，「光復」一詞指的是將屯門公園的大陸性工作者趕出公園。這個時候「光復」的涵義更直接地包含著對大陸移民的道德質疑。如果說光復屯門和光復上水都是具體的「光復」願景，對全香港的光復是否也只能限於這種片面的道德化想像，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根據葉蔭聰的分析「光復」一詞在香港政治詞彙裡跟「驅趕」與「占領」等詞自成一個系列。因此他認爲可以歸納爲一種空間取代時間的觀念轉變的過程（Ip 2020:104）。如此的轉變形同對開放式未來的放棄。所以對於劃界實踐民主化的可能性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假設說「光

復香港」是指收回原來擁有的失地的話，但這些原來有的本身也許並不存在，或者存在的形式並未達成一致，那麼我們就無法想像光復能恢復的狀態究竟是什麼？這種「烏托邦場景」的缺席本身可以視為法國哲學家儂曦（Jean-Luc Nancy 2003: 23-28）所稱之為一次體現「驚 [sic] 然回首，重建亡失共同體」（Nancy 2003: 23-28；譯文略微修改）。從這個角度來看，「光復」一詞的引用，確實可以視為一次香港這個多元社群納入由現代性主權所限定的共同體想像的案例。

倘若放在一個翻譯的脈絡看待的話，用英文「解放」（liberation）來解讀的情況，僅限於“liberation”一詞意指外敵被趕走的意義，並無法應用於奴隸獲得自由的情形。從這個角度來看，該口號更準確的譯法應該是“Recover Hong Kong,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但即使如此也傳達不出中文原句承載的感染力。畢竟，它讓返回邊界的泛泛訴求聽起來悖論似地變得進步——就像是用歐巴馬的語氣說出川普築牆的呼喚。怪不得香港的裝置藝術家林愷倩（Lam Hoi Sin），2019年8月25日在其臉書上發表圖案，將該口號乾脆譯為香港版的川普2016年的競選口號，“Make Hong Kong Great Again（讓香港再次偉大）”。

在政治構成中，前衛與邊緣不能光看數量比例去定義。例如，在香港主張回歸英國主權，抑或主張美國派軍隊去武力解放香港的團體固然存在，其成員人數據說不到萬人，地位相當邊緣。然而，在政治構成上，「勢」比「數」重要，否則香港最大工會——親共的香港工會聯合會，本來就會保持政治行動上永遠的優勢。「光復」一詞不容忽視的功效是，其中暗含的主權觀念限定了並主導了關於「自決」訴求的政治想像，讓獨立主權成為政治願景無法跨越的地平線。

這點讓我想起香港學者歐特曼（Stephen Ortmann）前幾年指出：

香港之所以民主化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這個都市缺乏完整國家性的條件。換言之，就是缺乏主權的兩種重要特徵，那就是政治結構無法自行決定，以及香港缺乏一種免於外力干預的自由。（Ortmann 2016: 109）

歐特曼（ibid.: 115）雖然並不贊成那些主張「主權就是民主化的基

本前提」的觀點，¹⁰但是一旦去參考他引證的書目就不難發現，這種主權之外的民主過程的前提就是建立在另一變相主權的基礎上：那就是美國外交政策對於「民主化」的要求（例如金融市場的開放或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以及「那些成功建立有效民主制度的政體可望最後被頒發（awarded）完整的獨立身分」（Caspersen 2011: 338）。歐特曼引用卡瑟佩森（Caspersen），將國家主權視為一種可以被世界強權所「頒發」的獎品，就意味著國家主權之上還有更高形式的主權。換言之，歐特曼的論點只是將主權從國家或人民共同體的層次轉移到更高的全球層次，就好比美國是全球主權的頂端，其中國際制度存在主權高低階序的意味十分濃厚。另一種廣為流傳的思路即認為，民主化歸根究柢就是一種根植於「人民」，並起源於「人民意志」的表現，因為「人民就是最高權威的泉源」（Caspersen 2011: 340）。然而，無論是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人民共同體還是具有強烈生命政治治理性意涵的國家主權，重點是這些傳統政治哲學概念均將國族形式及其所賴以再現的邊界視為一種實定性（positivity）的給出範疇。即使邊界的位置可以變更或移動，也無法取消其中具有生命政治功能的活動以及普世轉型及翻譯體制的運作。

對於為什麼會用「光復」而不是用香港自己在1945年日軍被趕走以後所用的「重光」的說法，我受友人的啟發也有一個不成熟的猜想。香港的中文政治語言在殖民地時代是相當貧乏的，而革命詞彙的發明幾乎也因為殖民地的狀態而沒有發生，以至於直到今天，香港政治語彙還在不斷反覆回收民國甚至是毛時代中國的革命語彙，而對「光復」一詞的不敏感，導致了一種歷史認知的錯位。這是否也是一種邊界的時空錯亂，不言自明。

香港左翼團體「夜貓」（The Owl）雖然曾經試圖將運動和光復一詞

10 關於主權與民主之間在政治哲學史當中的關係，以及香港過去十幾年興起的各種本土派對於主權的理解與立場的分歧，請參見李宇森（2019/08/13）所作的總結：「三十年來泛民主派爭取雙普選的運動中，一直避諱討論香港的身分政治和民主自主背後的政治意志來源，甚至連主權和民主的關係也不願涉足。」李文雖然聲稱「主權思索不必然指向港獨」，又凸顯「國族的劃界問題」就是作者屬意的公民民族主義的首要難題，可是文章還是無法避免重蹈現代性共同體思想的覆轍，從同一性與再現的角度去思考劃界實踐。結果，李文最後儘管一切還是將國族形式（而不是特定國族）視為一種政治共同體的規範。

airiti

蘊含的殖民鄉愁區分開來，可是他們並未同時針對主權對自決所產生的限定作用展開批判。2019年7月抗議高峰時，「夜貓」成員黃漢彤（Tony Wong）發布評論指出，光復這個詞無可否認地聯繫著英國殖民統治復辟的訴求。他寫道：

在大家心中，『光復』僅僅是象徵性。不是真的要求英國重新接管。但以象徵來說，這依然是詞不達意。因為我們追求的甚至不是還原以往的權力格局[…]我們要建立一個屬於香港人民的香港。（黃漢彤2019/07/24）

黃漢彤心目中的「大家」雖然不容「割席」，卻對諸如香港歸英運動、香港獨立運動與香港民族論的存在偏偏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這一事實可以說明以下的真相：與劃界的妥協式合謀早已成為左派的總體特徵。「光復」一詞即使加上後現代式的引號，也無法防堵該詞繼續承受大環境的影響。尤其如同黃漢彤那樣將「人民」視為領土所有者的觀念，延續著傳統現代性主權思想最有代表的組合——人民與國家——這種表述與香港大學學生會於2014年9月出版，由梁繼平等人合編的《香港民族論》的論述脈絡完全一致。可見，引號的使用不但顯示出新詞彙的缺乏，更意味著以「夜貓」為例的左翼團體仍然依賴於已劃定的邊界去思考香港的政治構成。

怪不得隱然導入的關乎妥協的說法，已在2019年6月由「夜貓」團體的另一核心成員覃俊基（Thomas Cham）在一篇題為〈左翼的失語——當運動和世界和你有所距離時應該如何自處〉的文章中予以正當化。文章雖然做了清醒的分析，指出右翼主導運動的事實，可是對此所做出的回應，竟然採取了一種焦點經濟的角度去評估市場占比。覃俊基（2019/06/18）指出：「但運動[就其目標和訴求而言]精確，就意味著容許左翼詮釋的空間極度狹小[…]在根本的立場上，左翼的想法無法map在當下的對抗之中。」覃俊基觀察力非常敏銳，給我們精準地抓住了真正的問題所在，其實是一種版圖（map）的危機，卻沒有進一步去積極發明新的製圖學一事，實為憾事。覃俊基回應這個製圖學相關的危機的方式，因為與劃界有關，所以值得大塊引用：

要做的是接受那些限制、然後徐徐圖之，慢慢擴大左翼思想的影響力，而不是自我劃界然後作眾人之敵。這是左翼最易邁上自絕

群眾之路的方法——無法接受難以述說，難被理解，然後故意將立場激化、批判所有較為「溫和」態度以突顯自己的正確。這就是far-left自我邊緣的老故事。

當然，另一邊的陷阱就是為求貼近群眾然後忘卻了自己的左翼立場。如何走這條鋼線，終究在乎一心。（ibid.）

關於版圖、劃界和界線的修辭確鑿無疑，可惜如此敏銳的分析卻並未帶動理論與視野的更新，讓左翼虛心承認其所處的位置、清醒認出未來的任務，將回歸邊界一事從政治構成中盡量刪除。相反，覃俊基詞彙中的劃界一詞，被理解成一種**自我限制的動作**，而不是一種共同實踐的契機。結果，這些力量被簡化成了一種對「群眾」不加區分的預設，就好比「群眾」（還是「人民」？）講的都是一樣的語言，所以就沒有任何社會翻譯的問題可言。

儘管覃先生的姿態表現出真誠且可敬的自我批評態度，他的論述卻缺乏自我批評的關鍵對象——左翼對回歸邊界的妥協。唯有納入劃界實踐的問題意識，政治構成相關的敘述才可能產生全新的版圖，即便一時之間無法順利收編社會擴音器來擴大聲勢。**換言之，覃俊基筆鋒下的「失語」狀態，其實是一種排除了語內翻譯與跨語翻譯存在可能的單語主義慾望的表現而已。**¹¹這種慾望就是由主權限定的社群觀，導致語言與人民之間劃上了直接的等同號。之所以失語是因為錯過了翻譯的契機。諸如將一切社會關係視為翻譯，將翻譯視為發聲的前提與語言操作的標準常態，以及將劃界實踐與發聲的可能性搭配在一起去思考等等契機。然而，我們一旦站在譯者的位置，「失語」的問題反而被譯者主體性位置的問題所取代，下文詳述。更何況，要是連邊界如何為資本主義價值攫取，而成為不可或缺的裝

11 香港大學教授潘毅早在2007年聲稱九十年代就是一種「失語的年代」（潘毅2007: 13-19），讓人隱約看到「失語」一詞在香港的脈絡裡，具有一種浮動性政治含意的系譜。有關反送中前後「失語」現象的問題，可另外參考許寶強（2020/08/31）〈「左翼失語」，還是被消聲的抗爭主體？〉一文。雖然我非常贊同許寶強在結語中主張：「『左翼』所扮演的角色，大概是[……]轉譯者（translators）。」但是對於譯者的角色與位置如何理解？以及翻譯實踐要怎麼定義？我的立場與許寶強那種認為可以跟「促進者」（facilitators）或「中介人」（mediators）等角色混為一談的觀點是南轅北轍。翻譯問題延伸出來的另一面向，乃為許文對「聲音」與「主體性」的理解。包括許多值得商榷的方法論的選擇，詳細討論請參見完整的單行本。

置一事，都沒有納入「聲音占有」（appropriation of voice）的戰略的話，那麼全球時代的左派即使聲勢再壯大也可能只是一種焦點經濟的腹語術，帶著左派口音去說出資本的母語而已。

上述兩種翻譯情境共同揭示出一條由三種元素組合而成的時代脈絡：（一）左派的歷史性挫敗、（二）返回邊界的慾望，以及（三）主權與自由的假定等同關係，這需要經歷翻譯的媒介才能掩飾成自然。而在香港，最能象徵這一時代脈絡的例子，莫過用筆名忤尚（Ng Soeng）寫作的Emily Wong與楊天帥（Yeung Tin Shui）所做的對談。楊天帥是一位年輕的香港藝術家和作家，在東京讀書。由他翻譯的墨菲（Chantal Mouffe）《寫給左翼民粹主義》（*For a Left Populism*, 2018）的中文版於2019年10月在香港書店上市。無需贅言，墨菲的作品以「政治邊境」（political frontier）為出發點。比起當前其他左派的思想，墨菲更加直接地以「回歸邊界」為己任。這樣的論述成爲一種界定政治視野而無法跨越的地平線的趨勢中，我們來聽聽他們的對話：

結果，這次的譯本確實獲得不錯的反響。坊間反應之熱烈，幾乎讓人誤以爲左翼論述在香港發酵已久，甚至已勢成一格。想深一層，才意識到，這股熱切正反映了左翼論述在香港的失落。

實情是，過去十年間，「左翼」在香港過得並不好。

〔…〕楊天帥坦言，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實在無法好好說明《寫給左翼民粹主義》對香港左翼的啓示，因爲有太多的不確定性。「現在說『左翼』也不知道指的是誰，定位很模糊。即使是以前很怕身分政治的那些『左翼』人士，現在也叫『香港人加油』啦，也沒有人再問『新移民係邊』」。

〔…〕那麼，香港到底需要多大程度的民粹？在楊天帥看來，民粹在香港的發展，甚至可以不劃下限。

「如果這樣講，quote出來會不會很大鑊？」楊想到了甚麼，先帶點無奈地自問，後又很快拋開了顧慮，「我覺得，香港人有幾仇恨呢個政權，就幾仇恨這個政權系最好」。（忤尚2019/11/21）

由於無力解釋邊界的建制如何深刻聯繫著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再生產，¹²香港左翼如同歐美左派一樣，在過去十五年間一再屈從於新自由主

義「別無選擇」預設下的「現實」，將返回邊界當成政治行動的前提。經過一種認同邊界並鞏固邊界的文化翻譯機制，邊界的兩邊出現了這樣的奇觀：邊界的這邊在無知的狀態下去消費「自由」的訴求，而邊界的那邊所消費的訴求則與「主權」相關。這場對外宣傳是為「自由」、對內是為「主權邊界」而戰的反送中運動，顯然包含著一種創造性的契機值得被分析。想要瞭解主權與自由之間的關連，以及翻譯體制在其間所起的差異作用，就不能不顧及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的意識形態問題。

四、定居殖民主義與「香港界址」

1997年後香港存在一種聲音，認為自身相對於中國而言是處於一種「賤民」（subaltern）的位置，承受著比英國殖民經驗更為暴力的二度殖民。不可否認的，在2020年7月1日的國家安全法強制施行後，香港形同進入類似戒嚴一般的常態性的緊急狀態，使得「二度殖民論」終獲驗證。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及其相關的七項具體執行方針，根據李宇森的分析，確實頗像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稱之為「常設性例外狀態」的措施（李宇森2020/07/11）。一般認為該法代表「中國」與「香港」間的邊界被弱化甚至被取消。但是從現階段（2020年8月）的角度來看，我認為該法反而比較像是一種將既有的國內邊界加強並武裝化的舉動，而不是取消。就好比中央政府打算將香港設定為政治隔離區一般，並在香港境內成立極權國家般的「雙重國家」行政架構。而國內邊界的武裝化，無疑是一種殖民主義治理技術——即使或者特別是針對所謂的分離主義而言。誠如法國北非殖民史學者勒庫葛蘭梅綜（Olivier Le Cour Grandmaison）指出：

的結晶，而這些社會關係主要取決於生產模式。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研究從資本作為一種社會關係的角度出發，力圖探討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所需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延續。這些條件的總稱乃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而它們主要的功能就是確保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賴以運轉的社會關係順利獲得延續。阿圖塞將這個面向的事情稱為「社會關係再生產」（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值得一提的是阿圖塞並未將邊界實踐納入「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社會關係再生產」的脈絡去思考。

「例外狀態」本來就是殖民主義治理性的特徵之一（Le Cour Grandmaison 2005）。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指控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形同殖民政權的觀點，在國安法於2020年7月1日生效後一夜間獲得了無法否認的鐵證。竟然還有中國背景的學者隨後主張可在國安法的基礎上，啟動一套「第二次回歸」的解殖政策來「收復人心」（楊錦麟2020/07/09），可以視是為與殖民共謀的惡例之一。

在痛定思痛之餘，所謂的「二度殖民」論述，不應該抹去本土人口與定居殖民主義的歷史轉移關係，及此一事對於邊界思考的啟發。這種關係曾在1990年代出自香港的資本家、經理層和專業人士在中國操練的「北進殖民主義」中達到頂峰。眾所周知，香港定居殖民主義的歷史經驗並不受限於白種英籍人口。然而，鮮為人知的關鍵一點是，華人主動參與定居殖民主義的適用範圍不僅包括與港英當局合謀的華人菁英，同時還包括了壓倒性的多數來自外地的「當地華人」人口。

正因此，學術界過去十幾年形成有關香港「勾結共謀」殖民主義的共識當中，階級問題的部分是需要適度修正。羅永生已成經典的《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利》（*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2009）一書中闡發過的「殖民共謀」的觀念而言，最重要的是修正與批判。此一觀點，間接來自張少強的《管制新界：地權、父權與主權》（2016）。在羅永生那邊被描述為英國殖民當局與華人菁英間的共謀，在張少強筆鋒下反而成爲一種跨階級全民參與的歷史運動。在《管制新界》一書發表前，離岸中國學研究領域（the field of offshore China studies）向來把占了香港幅員的86.2%的新界看成是扎根於土地，且未曾受殖民主義影響的傳統中國社會的原型。經過張少強有力的反駁，這一歷史悠久的論點被推翻一事就足以說明，香港「在地人」社群基本上是個殖民主義人口治理的虛構。實際上，土生土長的「在地人」人口比直到1970年代，也就是回歸談判啓動前十年，才開始成爲香港人口的多數，而這個五方雜處的人口在語言上的異質性相當高。關鍵在於，「在地人」的虛構論述將知識生產的認識論面向和香港內部邊界的法理面向結爲一體。

airiti

1898年大清與大英兩帝國簽署的《拓展香港界址專條》條約，將深圳河以南、九龍界線街以北的土地還有一些外島一起劃為「新界」並租賃給英國。行政上，新界跟香港島與九龍之間一直保持著清楚的「界址」劃分。對於新界，大清、民國或是人民共和國不但從未喪失過主權，而且即使在英國管轄之下，「新界」也一直保持著特殊的行政地位。此舉形同將「界址」（邊界）永久性地內嵌於皇家殖民地香港的內部政治型構過程。這樣一來，由內部「界址」建構出的「土著性」（indigeneity）就變成了一種針對人口管理，並結合了知識與法理雙重邊界的治理技術。不管這是出於權宜之計還是精心設計，其效果在於它都能把難民、移民以及流散人口等各個階層，通通轉化成在地人口。並在此基礎上發明「傳統中國社會」的認同形象，作為白種定居殖民人口得以成立的不可或缺的對照組。如此精妙的人口治理布署，遮蓋了華人人口自身為定居殖民主義者的特質。香港華人不僅是定居殖民主義的受害人，同時也是定居殖民主義的創意詮釋者與行動主體。而這些具有自身能動性的定居殖民主義華人，並不只是像羅永生所指出的受限於菁英階層而已。菁英在共謀之餘，廣大而多元的華人人口普遍而積極地參與了定居殖民主義的主體性建構過程。縱使是上下關係嚴明的父權體制，假設沒有弱勢一方默許的參與的話，也無法成立。換言之，廣大湧入英屬香港的各個社會階層的華人移民，在殖民當局精心設計的布署下，成為香港「在地人口」的過程中，都順便完成了一種脫胎換骨的程序，成為名符其實的定居殖民主義的主體。

誠然，想要瞭解當代香港左翼棄守劃界實踐批判一事，對左翼政治立場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必須從定居殖民主義的歷史切入。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這個課題的被放棄所帶來最直接的後果，像是一種壓抑的重返。於是乎，一種政治幻覺開始作祟，讓邊界以類似於莫騰（Fred Moten）和哈內（Stefano Harney）在《地下公社：逃犯的規劃與黑色研究》（*The Undercommons: Fugitive Planning and Black Study*）一書令人印象深刻地稱之為「包圍」（the surround）的方式發揮作用（Moten and Harney 2013: 17）。「包圍」指的是定居殖民者的特殊幻想，乃將自身想像為遭受到土著的圍攻與入侵，其用意在於給定居殖民者針對土著反過來施暴一事找到

airiti
正當性的藉口。

被包圍的幻想在歷史當中有跡可尋。從保衛天星碼頭運動（2006）對凝視（gaze）社群的預設起，到毒奶粉事件（2008）以及隨後的走私交易所造成香港嬰幼兒奶粉的嚴重短缺（2012），對於高度依賴移工褌姆的香港資產階級所造成的心靈創傷等等一系列事件中，這種被包圍的幻想的陰影隱約可見。甚至存在一個名為「中共殖民香港資料庫」（其英文名稱作“savehkfromchina”，可譯為「從中國拯救香港」）的粉絲維基（Fandom Wiki），以「消滅邊界」、「人口清洗」、「經濟侵略」等條目建構出一種完整的生命政治浩劫的虛構計畫。

當然，最清晰的例證莫過於關於中國大陸「蝗蟲」入侵的橫向種族主義論述。集中體現在《蘋果日報》於2012年刊登的一則由群集募資的整版廣告上（圖1）、2014年2月16日的「廣東道驅蝗行動」，以及2014年刊登於《新報》類似的全版廣告（圖2）。香港居民或許並不清楚「蝗蟲」這個「迷因」（meme）是個植根於殖民主義與反共主義歷史記憶的混合。1950年12月11日的《時代週刊》雜誌封面是一群蝗蟲從毛澤東的面孔後面湧出（圖3）。在殖民主義的歷史中，對蝗蟲的指涉通常會被追溯到法國耶穌會士譚衛道（Armand David）。據說他曾用這個詞描述陷入貧窮且被戰爭撕裂的人群，在實施開採後所導致中國自然環境的惡化。但是經過我在譚衛道電子化的著作裡搜尋未果的經驗來看，這個論點暫時無法確定。唯有二手著作（圖4）確實如此記載了「蝗蟲論」的出處。值得注意的是，清朝末期戰亂飢荒帶來生態破壞現象的主因，都是與帝國入侵史有關的政治動亂直接或間接造成。然而，在倒果為因的殖民主義視角下，這些現象都被當做華人「民族劣根性」的明證。



圖1：2012年02月01日刊登於香港《蘋果日報》與《爽報》的全版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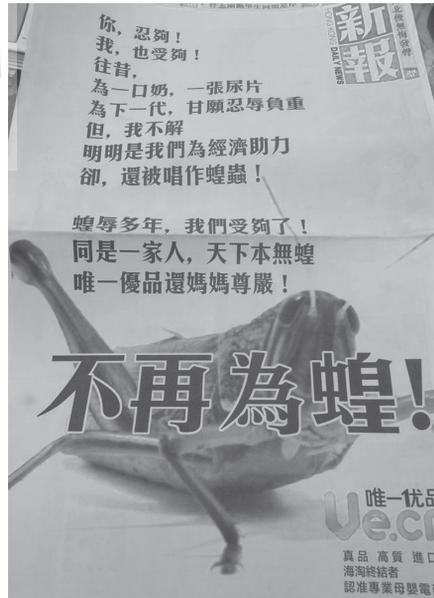


圖2：2014年10月31日刊登於《新報》封面的全版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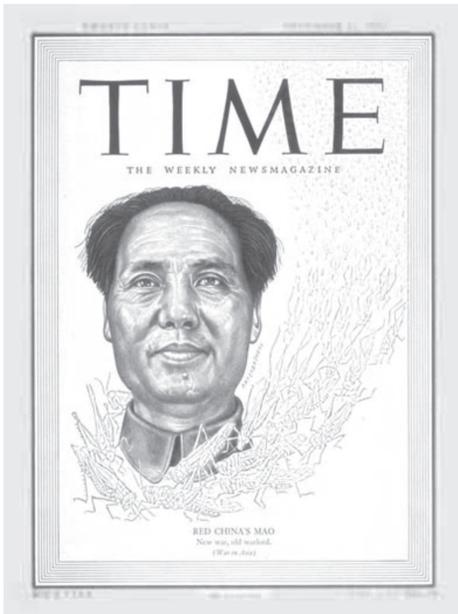


圖3：美國《時代週刊》1950年12月11號封面

float a log, there are no longer any logs to float. Père Amand David, who spent years on the Thibetan border, comments bitterly in his *Journal de mon troisième voyage* on this locust-like propensity of the Chinese to destroy every green thing wherever they penetrate, for when the trees are gone comes the turn of the scrub and bushes, then the grass, and at last the roots, until, finally, the rain washes down the accumulated soil of ages, and only barren rocks remain. This fact accounts for the

圖4：截圖來自立德樂 (Archibald John Little 1901: 257) 於 *Mount Omi and Beyond: A Record of Travel on the Thibetan Border* 一書中引用譚衛道 (Armand David) 神父的觀點，認為中國人有種「蝗蟲般的習性」。

airiti

香港輿論界過去十年對「蝗蟲」這個迷因的病毒式傳播，透過數位平臺擴散（Ong and Lin 2017）與媒體作秀效應，卻表明定居殖民主義透過倒置投射的方式壓抑了自身的歷史性。就好像香港的華人人口本身並無定居殖民主義經驗與情結可言。作為一種殖民主義的主體性技術，「包圍」顯然是一種能生產出真實效果的幻覺。其中結合了想像的能動性與壓抑的創構性。這種特殊的結合，可以從「溝淡」一詞（可當「補倉」之意）的變化看出。這個原本用於表示股票市場買空的口頭語，自從2010年代起和「左膠」一詞一樣，開始占據香港大眾文化想像的重要位置。

作為新的流行語，「溝淡」一詞意指當地人口被「外來的」中國人沖淡血統之意，就好像香港因為一些人開始幻想「被包圍」，所以自然就開始產生「被滲透」的焦慮。熔投資心態、歧視的恐懼與歷史的壓抑（畢竟香港華人本來都是「外來人口」）於一爐的「溝淡」一詞的廣泛流傳，反映出「包圍」的幻想富有極高的生命政治情感內涵。結果，邊界不但染上了「最後一道防火牆」的緊急色彩，就好比可以劃上「文明」與「野蠻」之間的界限，而且還滲透到包括分子在內（所謂「血統」）的微觀層次。

香港的定居殖民主義歷史經驗，假設與大英帝國另一領地——巴勒斯坦託管地展開對比的話，是很有啓發性的。正如《部分人的正義：法與巴勒斯坦問題》（*Justice for Some: Law an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的作者艾拉卡特（Noura Erakat 2019）在一次訪談中的總結：「復國主義原本是為了修正和回應歐洲將猶太人從白人中驅除出去〔…〕然而，復國主義運動對此所做出的回應並未從對付白人至上的體制入手，而是將它內在化了。」（Erakat 2019/08/30）根據艾拉卡特的觀點，復國主義運動的歷史意義其實是一種變相的西方幻覺。¹³畢竟，二戰前猶太人的歐洲白種身分曾經被嚴重質疑。歐洲各國白人至上帝國主義者在白種與歐洲地理之間劃上等同關係，建構西方幻覺之際，猶太人從中被排擠並列為一個非白種、非歐洲的社群。如此被排擠於白種歐洲之外一事其實就等於猶太社群的生命政治次第被降格。復國主義者認為，想要重回白種歐洲世界的唯一法門，似乎就

13 有關西方幻覺，請參見Sakai（2005）。

在於攫取並占據一份歐洲「之外」的領土，以辯證法的方式否定之前的否定。復國主義者一心致力於脫亞入歐的宏業，力圖讓巴勒斯坦那塊土地脫離「非歐洲」的想像位置，建立一個標榜「歐洲價值」的新國家——「以色列」，進而恢復猶太人的白種歐洲身分。復國主義那樣的辯證策略雖然算是一次變相入歐的捷徑，可是對於猶太人被排擠的歷史經驗反而構成了最大的諷刺。

復國主義對於西方幻覺的肯定與鞏固背後隱藏的生命政治動機，與香港華人追求自決的情形非常類似。畢竟，後者突然被1981年頒布的《英國國籍法》剝奪了標準的英國國籍。如伊莫金·泰勒（Imogen Tyler 2010: 62-63）指出，該法針對國籍和公民身分創造出幾個差異性的類別：「其中有一類是『英聯邦公民』（Commonwealth citizenship），它去除了英聯邦和香港的英國國民在聯合王國居住的歷史權利。」1981年的《國籍法》必須被看成是導向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準備工作，它開啓了一個關於英國公民身分持久性的生命政治。用泰勒的話說，這是一種「在設計構想上」刻意導向「失敗」的公民身分：「英國內部喪失公民權的人口存在（例如香港華人）並非由於設計缺陷導致的意外不幸，而是一種給整個英國公民權體制奠定基礎的刻意措施。」（ibid.: 61）通過一個象徵性的舉動，英國很清楚知道，那將成爲中國的問題的情況下，才在香港推進代議制民主；而且是直到修訂英國本國的國籍法、排除了香港人之後才這麼做。這一舉動在象徵與制度層面上，將萌芽中的香港代議制民主（更遑論英國本身行之有年的代議制民主）與制度性種族主義的歷史情結結合在一起。導致兩者的複合體持續發酵並擴散至今——正如奴隸制的歷史仍在影響美國自由主義的建制，抑或巴勒斯坦的種族隔離和歐洲排猶仍影響著以色列的建制一般。

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不同地區的定居殖民主義之間可能形成某種互動，甚至是合謀的關係。例如，2019年感恩節當天，香港的團體對川普當天所簽署的兩條涉港法案，表示感恩而舉行的示威。在一個富有白人定居殖民主義濃厚意味的日子裡，同樣也是定居殖民區域的香港，數以萬計的

人聚集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示威。當時舉起的美國國旗和「肌肉男川普」海報數量之巨，只有在川普競選活動現場堪與之匹敵。就數量而言，如前所述，香港的左翼討論中，「勢」與「數」的區隔問題，似乎一直沒有獲得正視。

頗具指標性的例子，則是嶺南大學文研所教授葉蔭聰於2019年10月，針對一篇批評反送中為一場右翼主導的運動，並引起廣泛討論（甚至被譯成英文並公布於《流傘》網站）的網路文章時，葉蔭聰（2019）就是以數量為優先的角度，去論斷種族主義在2019年跟2011年前後相比反而顯得少，更沒有什麼「擴大化的跡象」可言。即便採用一種類似算術平均數的方法，力圖說明那些美國國旗、港英旗與川普海報都只是一些邊緣團體的現象，也無法讓這種跨國定居殖民主義合謀關係消失。唯有訴諸文化翻譯機制才能達到那樣的效果，透過翻譯將主權與自由等同起來並同時遮蓋那個等同的過程。

假設說定居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主權與自由的等同假設之上。那麼我們不妨參考黑人激進傳統出身的一位傑出的當代哲學家——錢德勒（Nahum Chandler）在《X——作為思想問題的黑人問題》（*X—the problem of the negro as a problem for thought, 2015*）一書中所提出有關主權與自由的觀點。錢德勒認為，主權本質上需要從自身與奴役，而非與自由的關係上來理解。這就是「主權與被奴役之間的關連的問題」（Chandler 2015: 28）。

眾所周知，根據現代自由主義傳統，一般認為主權與自由之間存在某種等同關係。主權就是自由的基礎，自由才是行使主權的具體體現。我透過錢德勒的問題意識才頓然明白，兩者間的連貫性唯有從白種定居殖民主義的角度入手才能確定。假設換一個角度，從奴役的角度出發的話，兩者間非連貫性的關係就會馬上顯現。現代主權與奴役制之間的合謀，不僅是一種歷史事實而且更是一種形式的問題。前者必須依賴一種人民共同體的形式才能確立；凡是人民共同體都無法迴避將「人民」化為一種與其他人羣之間，存有某種種類差異（specific difference）的區別。一旦開啓種類差異的大門，現代奴役制的人種差異預設才有可能成立。此隱藏於主權之中

airiti

的人種差異前提，就是錢德勒稱之為現代性的「基礎設施的組織」（ibid.: 20）。根植於生命政治基礎設施的主權，具有一種甩不掉的悖論特性。而正是這種特質在主權與自由之間的關係起著決定性作用，同時切斷了兩者間平順連貫的可能性。除非像白種定居殖民主義那樣，將自由限定為一群人——例如白種社群的自由——相對於另一群人——例如被奴役的不自由。面對奴役的歷史正義問題，我們很可能將批判的矛頭指向「西方」這個曾經支配世界並行使最高主權的地理區域，進而將「西方」與「白種人」等同起來。然而，我們一旦將現代性的種種社會關係歸納為「白種西方」支配世界的格局，一個關鍵的問題反而會消失。「西方」與「白種人」等範疇的存在，以及兩者間的假定等同，是否先於支配世界的歷史過程？面對這個問題，我們最後必須承認，所謂現代性不是別的而正是一種建立「白種」與「西方」等假定統一性範疇的過程。換言之，主權的悖論源自「人種」及其派生概念的「民族」這個範疇本身所代表特殊性與普世性之間的合謀關係。被假定為非白人人種的人若想將主權占為已有的話，那個動作本身就必然形同做出一次對人種差異體制的肯定，縱使最後成功取代了被虛構為白人社群的殖民統治者的位置。在解殖運動的歷史潮流中，主權獨立被視為解決「白種西方」支配問題的標準答案一事，實則並未切斷主權與生命政治基礎設施——人種差異布署之間密不可分的關連。雖然有一種觀點認為由歷史白種至上體制產生的主權，總有一天可以擺脫種族主義的架構，讓世界各個人種與各個民族都能同時享受主權所代表的尊嚴與自由，但是這種看法說穿了只不過是一種私有制的意識形態。

誠然，現代主權如同哈特（Michael Hardt）與納格里（Antonio Negri）所說那樣，將那些原本構成主權的關係，通通轉換為一種所有權的對象（Hardt and Negri 2001: 95）。這點恰似資本並非一種物品而是一種社會關係一樣，甚至可以說主權其實就是資本的類比性延伸。正因此，兩者間形成了一種歷史互動關係，讓主權國家成為一種成全資本積累的最佳社會組織方案。為了打破主權、資本與人種這些將社會關係，特別是非連貫性（discontinuity）的關係，化約為獨立存在事物的現代性支配布署，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劃界實踐的批判性理論。

因此，自由與主權之間的關係，應該視為一種非連貫性的狀態。主權並非自由的保障；而自由並非主權的體現。爲了掌握這層關係，錢德勒主張採取一種他稱之爲「去沉降」（desedimentation）的方法。其中關鍵在於遵守一種「雙重的動作」（double gesture）：凡是用於對抗白種「純種論」的認同，務必都包含著無法馴服的差異。而由此產生的問題意識——一種徹底解除人種差異裝置的嘗試，往往需要透過一種「激動的爆發」（agonistic irruption）事件才會顯現。我認爲錢德勒所說的「激動的爆發」可以理解爲同一與差異梯度（gradient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之外，非連續性因素出其不意的出現。正因如此，錢德勒才會強調「曖昧性的維持〔…〕又是一種政治，又是一種實踐的藝術」（Chandler 2015: 18-19）。這裡所謂的「曖昧性」，可以理解爲一種針對邊界的介入。換言之，真正的自由並不在於主權的掌握與行使，而是從總體上拋棄由邊界的單邊配置產生的政治主體。

五、結語

假設說基進的未來想像，起碼需要包含一些針對生命政治劃分梯度與資本主義普世轉型版圖的介入的話，¹⁴那麼這種另類想像在香港具體脈絡裡，至少應該呈現出世界與中國的生命政治版圖，同時產生丕變的狀態。在一個以主權國家爲單位的國際體系裡，包括分離的權益在內的民族自決權與邊境不可侵犯的自主權之間，無法化約的矛盾，其實就是各種生命權力叢生的溫床。然而，香港的知識與文化界從2006年天星碼頭事件起，幾乎整個精力與創意，全部都灌注在歷史記憶的保全，以及人民共同體再現／代表權的爭取這兩項大任務上。導致回歸邊界的轉向漸漸成爲政治主流。結果，一種兼具創意性與前瞻性的未來想像變得日益無法思考。持平而論，這個問題不只是香港的，而是全世界共享的劃界困境。本文著手於

14 由於篇幅限制的緣故，原稿有關普世轉型與世界地理劃分想像之間的關係的相關討論均無法納入。

airiti

探討這種全球困境在香港右翼轉向過程的系譜，特別是2006年起左翼日益陷入了「失語」的窘境，並漸漸從回歸邊界那兒去尋找政治資源。從整體來看，那就是一次與轉型想像相關的嚴重危機。

近幾年西方激進政治思想圈出現了各種各樣「非轉型」的主張。例如：沒有過渡期的革命政權（Hazan and Kamo 2013: 35），或者沒有轉型期的生態文明（Désobéissance Écolo Paris 2020）。在衡量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困境之際，英國理論家多士卡諾（Alberto Toscano）曾經清醒地指出：「從當代批判性思想內部出發，轉型的問題依然含混不明，甚至根本就是無法思考的。」（Toscano 2016: 213）西方當代激進政治思想圈對於此困境的回應，往往就是針對**轉型**及其所屬諸如時間（例如階段性的過渡期）、空間（例如獨立自主的管轄區域）與主體性（例如前衛政黨或人民共同體）等概念，加以全盤否定（ibid.: 213-214）。弔詭的是，正當轉型思想陷入了如此徹底危機之際，轉型的急迫需求，從能源轉型與生態轉型起，到文明轉型與物種關係的轉型，恰好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

香港的反中共本土運動偏偏將普世轉型視為抗爭的核心目標。所呈現的情景與多士卡諾筆鋒下的西方激進圈可謂180度相反。然而，凡是普世的主張往往「內嵌於一系列界限、邊界與限制的特定組合之內」（Walker 2009: 257）。與其幻想著一切邊界的消失抑或一切邊界的回歸，不如去發明新的轉型論述與實踐。故此，多士卡諾坦承：「為了打通因廢功而壅塞的左翼戰略想像，一種新的轉型概念十分有必要。」（Toscano 2016: 216）

有趣的是，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多士卡諾將「一個國家內的兩國家」（two states in one state）這種「雙重權力」（dual power）的局面當做再思考的出發點，想必會招惹一些批評的聲音。這些批評聲音會指出香港「一國兩制」的破滅，已經足以證實多士卡諾這個點子其實是沒有出路的，或者至少無法應用在香港身上。在此值得一提，便是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彭麗君的觀點。在其英文著作《人民的體現：雨傘運動前後的香港》（*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2020）一書中將「一國兩制」的兩制概念視為一種理論與實踐的泉源，「與民主

非常相關」(Pang 2020: 12)，確實可以視為一種對多士卡諾的迴響。¹⁵然而，即使多士卡諾的點子也難免包含一些將國族形式當做潛在性的預設。¹⁶因此，我認為與其完全放棄轉型的概念，抑或在一國之內去圖謀轉型的基礎，倒不如去探討有無可能將轉型當中那些牽涉生命政治對比架構的部分——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加以置換或刪除？

本文透過各種不同脈絡，從宏觀的國際地緣政治到微觀的個人互動，將翻譯視為一種典型的劃界實踐，力圖對於如此的置換工程做出初步的貢獻。假設想要沿用多士卡諾的「雙重權力」的概念作為線索的話，我們或許可以說，作為一切語言行為的範本之翻譯，其實就是「雙重權力」最實在的所在之處。然而，要如何去想像一種以翻譯為共通語言的社群或國家一事，可謂超出了以再現與代表為基礎的現代性政治哲學的範疇。對於這點，沃克(Gavin Walker)的分析可以視為一種對多士卡諾的間接補充甚至更正。因為前者才讓我們清楚瞭解，「國族的問題往往牽涉一群特定的歷史議題，也就是說，往往與轉型的問題相關」(Walker 2016: 70)。沃克給我們的啟發就是轉型與翻譯必須納入同一個脈絡去思考。國族一般的形式作為世界版圖生命政治劃分的範本，其實就是資本主義轉型不可或缺的必備條件。蒙受這個論點的啟發，我們要提的問題不再是「這個落後的國家到底要怎麼樣才能成功轉型成為先進的民主國家？」，而是什麼樣的

15 雖然我非常贊成彭麗君對單一權力中心與主權邊界的質疑，並且承認在這點上她與陳清橋(Chan 2020)、葉蔭聰(2020)的重大不同。但是我認為《體現人民》一書中那樣將人民視為一種實定性的存在(Pang 2020:13)，在方法論上已經產生了無法克服的矛盾，實不可取。持平而論，以上這個觀點還是需要針對彭麗君引用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作法展開具體分析才能確立。重點是阿倫特將「言語」(speech, Arendt 1998: 178)當做人類社會平等的基礎一事已經包含了一些有關「正常」語言(＝本國語言)與「派生」翻譯(＝外國語言)之類的預設，而這些預設其實都是傳統現代性社會關係梯度(亦即從殖民到帝國的梯度)的基礎。

16 多士卡諾主要是在回應美國左翼知識分子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近年以普世軍隊實現民主的主張(Jameson 2016)。然而，詹明信的構想不但只是單獨針對美國一國而已，而且更沒有具體去說明從美國帝國國族主義全球軍事布局到國民軍隊的轉型過程應該怎麼處理？詹明信僅僅宣稱他構想中的普世軍隊「無法展開海外戰爭」(Jameson 2016: 28)，但是「基地」相關的討論不但非常薄弱(僅限於基地扮演的經濟角色而已)，而且完全迴避了美國在全球上現設800多軍事基地的事實。

airiti

轉型實踐才能克服資本主義生命政治的劃分製圖學與翻譯體制？誠如沃克指出那樣，「轉型與翻譯每每復現都是打開新的政治格局的潛在契機」（Walker 2016: 194）。因此，沃克建議我們從方法論的層次開始去堅決破除國族形式的給出性質，並將之視為一種政治範疇，也就是說，一種在構成過程上滲透著政治關係（支配與剝削）的建構。想要破除「國族形式的給出性質」的話，**單單指出「國族」是一種「歷史建構」一事是不夠的，而是需要從劃界實踐切入。**

如今中美戰爭隨著諸如科技、貿易、供應鏈、金融、資訊與人工智能等各種戰線的啟動繼續延燒。而邊界普遍被武裝化（weaponized），導致熱戰的可能性日益增加。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法爾克（Richard Falk）在2020年7月判斷「可能以冷戰開始的『中美新冷戰』局勢隨即引爆大型熱戰的可能性與美蘇冷戰時代相比更大」（Falcone 2020）。我在2020年8月執筆之際，難免悲觀地認為，也許我們已經處於一種為時已晚的階段。雙邊升級的動態似乎進入了不可逆轉往上爆發的惡性循環。甚至所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已經變成了日益逼近真實的預言。果真如此的話，**那麼反修例運動的歷史意義可能最後定義為一次具有悖反性質的加速主義運動（accelerationist movement），最終得透過人工智能自主武器的軍備競賽與熱戰的爆發這個恐怖手段去成全資本主義下一階段轉型的提前登場。**

雖然自由主義戰爭國家對於奴役制的歷史責任已經是廣為人知的事情（儘管這些責任的範圍與具體意義依然十分模糊）。可是就自由主義戰爭國家為其反自由主義敵國（illiberal enemies）應該負起何種歷史責任的這個歷史正義的問題而言，連一個廣獲正當性的初步提法，似乎都還是十分遙遠的情景；更何況是個有雛形的答案。德國法學家弗倫克爾（Ernst Fraenkel 2017: 203）於1941年在美國流亡中完成的經典著作《雙重國家：為了獨裁理論的貢獻》一書的結論指出：「似乎有必要反覆指出外交政策在納粹主義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弗倫克爾將一戰後英、美、法外交政策對德國所造成的打擊，視為納粹黨崛起的關鍵因素一事，對我們依然有

著敲山震虎的意義。更何況過去十幾年我們才慢慢開始釐清，美國對於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提供金融、法理、論述與技術協助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我們不妨去假設，武裝自由主義儘管與其歷史他者——從奴役到恐怖分子與獨裁——之間的互動，存在著這麼多的黑暗密史與合謀，可是它之所以偏偏持續享受如此指標性地位的原因，恰恰就是因為它不斷研發出各種有效抵賴或轉嫁這些歷史責任的機制。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其實是一種轉型論述與翻譯再現的霸權，而其中最重要的機制莫過「邊界」。

如今面對又一次反自由主義敵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之際，左翼假設不是從邊界的取消抑或邊界的捍衛，而是從劃界實踐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連這個角度重新出發的話，一定可以避免成爲一種加強邊界的回歸與加速自主武器與演算治理之幫手，進而對於截然不同的轉型實踐做出重大貢獻。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Nancy, Jean-Luc (儂曦·尚呂克)，蘇哲安 (Jon Solomon) 譯。2003 (1986)。《解構共同體》*Jiegou gongtongti* [*La communauté désœuvrée*]。臺北 (Taipei)：桂冠 (Laureate Books)。

忤尚 (Wong, Emily)。2019/11/21。〈專訪《寫給左翼民粹主義》譯者楊天帥：政治敵人與民粹必要〉“Zhuangfang xiegei zuoyi mincui zhuyi yizhe Yang Tianshuai: zhengzhi diren yu mincui biyao”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Yeung TinShui, translator of *For a Left Populism*]，〈虛詞〉*Xuci*。Retrieved from: <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1139.html?fbclid=IwAR1u5sXGpkZAoCcOuehO2EUINcuFQt3KVO6Fng0c3pjjUTJXj5RVVkkOltM/> on Dec 05, 2019.

我要攞炒 (Ngo yiu laam chau)。2019/06/11。〈【突發】正式開火！第一批信已發出！我地香港人要幫政府官員、保皇黨取消外國護照！〉“{Tufa} zhengshi kaihuo! Diyipi xin yi fachu! Wodi xianggangren yao bang zhengfu guanyuan, baohuangdang quxiaoo waiguo huzhao” [{Breaking}]The war is officially on! The first letters have been sent! We Hong Kongers are help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royalist party cancel foreign passports]。

《LIHKG》。Retrieved from: <https://lihkg.com/thread/1204306/page/1/> on Aug 17, 2019.

李宇森 (Lee, Yusun) 。2019/08/13 。〈光復什麼，為何革命：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政治理念雜議〉 “Guangfu shenme, weihe geming: xianggang fansongzhong yundong de zhengzhi linian chuyi” [What is to be recovered and why should there be revolution: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the political concept of the anti-ELAB movement in Hong Kong] 。《燃燈者》 *Randengzhe* [*Truthseeker*] 。Retrieved from: <https://truthseeker922.wordpress.com/a-treatise-on-political-thoughts-of-the-anti-extradition-bill-movement/> on Feb 27, 2020.

——。2020/07/11 。〈以內戰為管治——香港抗爭鎮壓的例外與日常〉 “Yi neizhan wei guanzhi – xianggang kangzheng zhenya de liwai yu richang [Civil war as governance – the quotidian and the exceptional in the suppression of Hong Kong’s protest movement]” 。《燃燈者》 *Randengzhe* [*Truthseeker*] 。Retrieved from: <https://truthseeker922.wordpress.com/status/?fbclid=IwAR2jlrB6yGBO0-oJL0kZLSjtOfRM8NWswTzAwST0VQrb5OUDQBs2nnhCrNY/> on Jul 12, 2020.

周顯 (Chow, Hin) 。2018/04/11 。〈焦土派是如何出現的？〉 “Jiaotupai shi ruhe chuxian de” [How did a scorched earth faction develop?] 。《am730》。Retrieved from: <https://www.am730.com.hk/column/%E8%B2%A1%E7%B6%93/%E7%84%A6%E5%9C%9F%E6%B4%BE%E6%98%AF%E5%A6%82%E4%BD%95%E5%87%BA%E7%8F%BE%E7%9A%84%EF%BC%9F-122147/> on Oct 21, 2019.

章太炎 (Zhang, Tai-Yan) 。2017 。〈《革命軍》序〉 “Gemingjun xu” [Preface of the Revolutionary Army] ，《章太炎全集 第10冊》 *Zhangtaiyan quanji di shi ce*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Taiyan. 10*] 。上海 (Shanghai) : 人民出版社 (People's Press) 。

張少強 (Cheung, Siu Keung) 。2016 。《管治新界：地權、法權與主權》 *Guanzhi xinjie: diquan, faquan yu zhuquan* [*Managing the New Territories: Land, Law, and Sovereignty*] 。香港 (Hong Kong) : 中華書局 (Chung Hwa Books) 。

梁啟智 (Leung, Kai Chi) 。2017 。《獨立之路：從前蘇聯省思香港未來》 *Duli zhi lu: cong qiansulian xingsi xianggang weilai* [*On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Reflections on Hong Kong’s Fu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臺北 (Taipei) : 新銳出版社 (Xinrui) 。

許寶強 (Hui, Po Keung) 。2020/08/31 。〈「左翼失語」，還是被消聲的抗爭主體？〉 “‘Zuoyi shiyu’, haishi bei xiaosheng de kangzheng zhuti?” [‘Leftist Aphasia’, or the silencing of the subject of protest?] 。《Matters》。Retrieved from: https://matters.news/@PK_Hui2020/%E5%B7%A6%E7%

BF%BC%E5%A4%B1%E8%AA%9E-%E9%82%84%E6%98%AF%E8%A2%AB%E6%B6%88%E8%81%B2%E7%9A%84%E6%8A%97%E7%88%AD%E4%B8%BB%E9%AB%94-bafyreiffnjhocnx4xhqytk7hyllbwnp2upoco4iyewm5bift6rxeypnqxte?fbclid=IwAR2m7G8SvXzBw2Ej9sMEZSDFqbh97bNsh_qS1SOgwbLH7dorrYflaTEybQ#_edn6/ on Sep 05, 2020。此文原載於《臺灣社會研究季刊》*Taiwan shehui yanjiu jik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115: 237-258。

單俊基 (Cham)。2019/06/18。〈左翼的失語——當運動和世界和你有所距離時應該如何自處〉“Zuoyi de shiyu – dang yundong han shijie han ni yousuo juli shi yinggai ruhe zichu” [Leftist Aphasia – what to do when there is distance between you, the world, and the movement]。《夜貓媒體》*Yemaomeiti* [*TheOwl*]。Retrieved from: <http://theowl.hk/2019/06/18/%E5%B7%A6%E7%Bf%bc%e7%9a%84%E5%A4%B1%E8%aa%9e-%e7%95%b6%e9%81%8b%e5%8b%95%e5%92%8c%e4%b8%96%e7%95%8c%e5%92%8c%e4%bd%a0%e6%9c%89%e6%-89%80%e8%b7%9d%e9%9b%a2%e6%99%82%e6%87%89/> on Jun 19, 2019。

黃漢彤 (Wong, Tony)。2019/07/24。〈沒有光復〉“Meiyou guangfu” [There’s nothing to recover]。《夜貓媒體》*Yemaomeiti* [*TheOwl*]。Retrieved from: http://theowl.hk/2019/07/24/%E6%B2%92%E6%9C%89%E5%85%89%E5%BE%A9-tony/?fbclid=IwAR04u3Anqa7bdcX7_YgzdwY7hguYPByS39BZSeMjCQVTaPgV0k8ljctO-VA/ on Jul 27, 2019。

楊錦麟 (陳子帛) (Yang, Jinlin [Chen, Zibo])。2020/07/09。〈香港如何實現「第二次回歸」?〉“Xianggang ruhe shixian ‘di’ erci huigui” [How Hong Kong Can Realize a ‘Second Retrocession’]。新加坡 (Singapore) : 《聯合早報》*Lianhe zaobao* [*United Daily News Singapore*]。Retrieved from: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200709-1067641?fbclid=IwARImAMOY-z_AvimRbqPM6nlEP7gPJLyScj5xsmsQnDP1D15UX_-MNYvgg/ on Jul 09, 2020。

葉蔭聰 (Ip, Iam Chong)。2019。〈回應趙蒙喲《時代遊戲》〉“Huiying Xian ‘shidai youxi’ ” [A response to Zoe Zhao’s “*Game of the Age*”]。Retrieved from: <https://matters.news/@zoezhao/%E6%99%82%E4%BB%A3%E9%81%8A%E6%88%B2-zdpuAvDCA9LJirBxRY3xP75eZY7CPMTXu6U38mrGwQ1F2cHi/> on Sep 30, 2020。

——。2020。〈直面香港這場「不知節制」的運動〉“Zhimian xianggang zhechang ‘buzhi jiezh’ de yundong” [Confronting this movement that ‘knows no limits’ in Hong Kong]。《思想》*Sixiang* [*Reflection*] 40: 195-208。

趙平復 (Zhao, Pingfu [Ozaki Takami])。2019/08/10。〈「英美港盟，主權在民」和「我要攞炒」的英語是什麼?〉“‘Yingmei gang meng, zhuquan zai min’ han ‘wo yao lanchao’ de yingyu shi shenme?” [What

is the English for “yingmei gang meng, zhuquan zai min” and “wo yao lancho?”]。《國際International》。Retrieved from: <https://international-online.org/2019/08/10/iad-english/> on Aug 10, 2019.

趙蒙暘（夕岸）（Zhao, Zoe [Zhao, Menyang]）。2019/10/10。〈時代遊戲〉“Shidai youxi” [Game of the Age]。《Matters》。Retrieved from: <https://matters.news/@zoezhao/%E6%99%82%E4%BB%A3%E9%81%8A%E6%88%B2-zdpuAvDCA9LJirBxRY3xP75eZYZ7CPMTXu6U38mrGwQ1F2cHi/> on Oct 15, 2019.

潘毅（Pun, Ngai）。2007。《失語年代的光與影》*Shiyu niandai de guang yu ying* [Shadows and Light of the Silenced Decade。香港（Hong Kong）：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Jinyibu Multimedia）。

鄭松泰（Cheng, Chung-Tai）。2014/01/14。〈「左·右膠之謎」：香港社會抗爭的本土轉向〉“‘Zuo-youjiao zhimi’: xianggang shehui kangzheng de bentu zhuanxiang” [‘The Mystery of Leftards and Rightards’: The Localist Turn in Hong Kong’s Social Protests]。Retrieved from: https://newsbeta.blogspot.com/2014/01/blog-post_8713.html?fbclid=IwAR3OSWYnAhuCkw43dEIPGbMrdM4QgoSABMBYJE-rB6o5nYesx7UMwuShK7Q/ on Oct 12, 2019.

懷火（Huaihuo [Reignite]）。2019/07/24。〈訪談Yashae：從反送中看大眾恐懼的物質基礎，及左翼與大眾／連登的距離〉“FangtanYashae: cong fansongzhong kan dazhong kongju de wuzhi jichu” [An interview with Yashae: Understanding the material basis of fear among the ma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nti-ELAB movement and the Left’s distance from the masses/LIHKG]。《Matters》。Retrieved from: <https://matters.news/@reignite/%E8%A8%AA%E8%AB%87yashae-%E5%BE%9E%E5%8F%8D%E9%80%81%E4%B8%AD%E7%9C%8B%E5%A4%A7%E8%A1%86%E6%81%90%E6%87%BC%E7%9A%84%E7%89%A9%E8%B3%AA%E5%9F%BA%E7%A4%8E-%E5%8F%8A%E5%B7%A6%E7%BF%BC%E8%88%87%E5%A4%A7%E8%A1%86-%E9%80%A3%E7%99%BB%E7%9A%84%E8%B7%9D%E9%9B%A2-zdpuAkTqH5jrNrNLWx2uHGK8BGwdhnpN43NpXKp3dUPVAGa3r/> on Oct 23, 2019.

二、外文書目

[Anonymous]. 2020/01/10. “Water is coming,” *Lundimatin*. Retrieved from: <https://lundi.am/Water-is-coming/> on Jan 25, 2020.

Arendt, Hannah. 199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ossat, Alain. 2019/11/01. “Hong Kong: Le somnambulisme des mouvements” [Hong

- Kong: The somnambulism of movements], *Lundimatin*. Retrieved from: <https://lundi.am/Le-somnambulisme-des-mouvementisteson/> on Jan 25, 2019.
- . 2019/11/25. “Hong Kong – Rétablir les droits de l’intelligibilité historique” [Hong Kong – Reestablishing the priority of historical intelligibility], *Lundimatin*. Retrieved from: <https://lundi.am/Hong-Kong-Retablir-les-droits-de-l-intelligibilite-historique/> on Jan 25, 2019.
- . 2019/12/09. “Hong Kong: Lettre ouverte (par mégarde) aux amis” [Hong Kong: Open letter (by accident) to friends], *Lundimatin*. Retrieved from: <https://lundi.am/Hong-Kong-lettre-ouverte-par-megarde-aux-amis/> on Jan 25, 2019.
- Brubaker, Rogers. 2010. “Charles Tilly as a Theorist of Nationalism,” *American Sociology* 41: 375-381.
- Buden, Boris. 2009. *Zonedes Übergangs: Vom Ende des Postcommunismus*. Berlin: Edition Suhrkamp.
- . 2020. *Transition to Nowhere: Art in History After 1989*. Berlin: Archive Books.
- Caspersen, Nina. 2011. “Democracy, Nationalism and (lack of) Sovereignty: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Unrecognized Stat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7(2): 337-356.
- Chan, Stephen. 2020. “Some thoughts on the endgame of resistance: Ngo-yiu Naam-chaau as terminal reciprocity,”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1(1): 99-110.
- Chan, Wilfred. 2019/08/08. “Hong Kong’s Fight for Life,” *Dissen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hong-kongs-fight-for-life/ on Feb 8, 2019. Chinese transl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theowl.hk/2019/10/29/%e6%8a%97%e7%88%ad%e6%98%af%e9%a6%99%e6%b8%af%e9%87%8d%e7%94%9f%e4%b9%8b%e9%96%80-wilfred-chan/?fbclid=IwAR3UNHpA1yft22AcU_adoYwTyac24tvs8e6DxVvG4nwtGpYGRjVe3OhGij4/ on Nov 1, 2019.
- Chandler, Nahum. 2015. *X—The Problem of the Negro as a Problem for Thought*.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Cheung, Eric. 2015/07/15. “Explainer: Sheung Shui shambles as parallel traders leave a trail of waste,” *Hong Kong Free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5/07/15/shambles-in-sheung-shui-as-parallel-traders-leave-a-trail-of-trash/> on Jan 25, 2020.
- Désobéissance Écolo Paris. 2020. *Écologies sans transition*. Paris: Éditions Divergences.
- Erakat, Noura. 2019. *Justice for Some: Law an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9/08/30. "Has international law failed Palestinians?" +972 Magazine. Retrieved from: <https://972mag.com/noura-erakat-justice-for-some-podcast/143122/> on Jan 9, 2019.

Falcone, David. 2020/07/09. "Cold War with China and the Thucydides Trap: A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Falk," *Counterpunch*.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20/07/09/cold-war-with-china-and-the-thucydides-trap-a-conversation-with-richard-falk/?fbclid=IwAR1YgNxdszYRaR8bdt3jMuLm2ZSTy4QfnXquLpAicWTN9O7g8re0bVTXSu0> on Jul 10, 2020.

Fraenkel, Ernst, translated by Edward Shils. 2017(1974). *The Dual State: A Contribution to a Theory of Dictatorship* (Der Doppelstaat. Recht und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1. *Empire*. Cambridge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zan, Eric and Kamo. 2013. *Premières mesures révolutionnaires*. Paris: La fabrique.

Ip, Iam Chong. 2020. *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London & NY: Routledge.

Jameson, Fredric. 2016. *An American Utopia: Dual Power and the Universal Army*. Edited by Slavoj Žižek. London & NY: Verso.

Keucheyan, Razmig. 2014. *Left Hemisphere: Mapping Critical Theory Today*. London & NY: Verso.

Law, Wing Sang. 2009.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Le Cour Grandmaison, Olivier. 2005. *Coloniser, Exterminer. Sur la guerre et l'État colonial*. Paris: Fayard.

Little, Archibald John. 1901. *Mount Omi and Beyond: A Record of Travel on the Thibetan Border*.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Moten, Fred and Stefano Harney. 2013. *The Undercommons: Fugitive Planning and Black Study*. Minor Compositions Press.

Neilson, Brett and Sandro Mezzadra. 2013. *Border as Method, or, The Multiplication of Labor*.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Ong, Jonathan Corpus and Lin Tony Zhiyang. 2017. "Plague in the City: Digital Media as Shaming Apparatus toward Mainland Chinese 'Locusts' in Hong Kong," in *Communicating the City: Meanings Practices, Interactions*, edited by Giorgia Aiello, Matteo Tarantino and Kate Oakley, pp. 149-165. NY: Peter Lang.

- Ortmann, Stephen. 2016. "The lack of Sovereignty,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d Democratisation in Hong Kong," *Asia Pacific Law Review* 24(2): 108-122.
- Pang, Laikwan. 2020. *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akai, Naoki. 2005. "Introduction: Nation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Mother Tongue'," in *Deconstructing Nationality*, edited by Naoki Sakai, Brett de Bary, and Iyotani Toshio, pp. 1-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2010. "Translation and the Figure of Border: Toward the Apprehension of Translation as a Social Action," *Profession* 2010: 25-34.
- Saleh, Yassin al-Haj, translated by Alex Rowell. 2018/07/16. "A Critique of Solidarity," *Al-Jumhuriy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ljumhuriya.net/en/content/critique-solidarity/> on Jul 29, 2018.
- Tilly, Charles. 2005. *Identities, Boundaries, and Social Ties*. Boulder &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 . 2006. *Regimes and Repertoires*.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oscano, Alberto. 2016. "After October, Before February," in *An American Utopia: Dual Power and the Universal Army*, edited by Slavoj Žižek, pp. 211-242. London & NY: Verso.
- Tyler, Imogen. 2010. "Designed to Fail: a Biopolitics of British Citizenship," *Citizenship Studies* 14(1): 61-74.
- Walker, Gavin. 2016. *The Sublime Perversion of Capital: Marxist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in Modern Japan*.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 2019. "The Accumulation of Difference and the Logic of Area,"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27(1): 67-98.
- Walker, R.B.J. 2009. *After the Globe, Before the World*. London & NY: Routledge.
- Wedel, Jeanine. 1998/05/14. "The Harvard Boys Do Russia: After seven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 financed by billions of dollars in U.S.," *The N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archive/harvard-boys-do-russia/> on Feb 5, 2020.
- Wood, Tony. 2018. *Russia without Putin: Money, Power, and the Myths of the New Cold War*. London & NY: Verso.